

四、在讲史料中论治学

《史料五讲》一书,顾名思义,以讲史料为其基本旨趣和主要内容。但是,因为治学的过程并非只有史料这一环节,故人们不可能完全脱离治学理念单纯地讨论史料问题。从齐世荣先生的学术道路和治学经历以及他的学术风格来看,更不可能在《史料五讲》中不涉及他的治学理论和学术风格。通观全书,依我的肤浅认识,我认为从治学旨趣来看《史料五讲》,它十分鲜明地反映了齐

先生的治史理念和史学风格。

概括说来,这一治史理念是:应当十分重视史料,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应当辩证地看待和运用史料,这是研究历史的关键环节;应当把史料、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以理论分析史料的价值,以不同方法采择和使用史料,使三者密切结合作综合考察,庶几得到近于历史真相的结论。齐先生的史学风格,从上文所述各项,或可见其大概,不再赘说。

(责任编辑:仲平)

史料扩充与历史认知

——读齐世荣先生《史料五讲》的一点认识

李 凯

一、史料的扩充与历史认知的深化

史料的处理从来都不是真实与虚假的简单的划分,而是人们认识历史的观念与方式之变迁的历史。齐世荣先生的《史料五讲》虽然叙事简洁,不奢谈理论,但在分析史料的搜集范围以及运用材料的优劣特点中,已体现了对于历史认知的不断深入。

以目录而言分为五个部分:一、略说文字史料的两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二、谈日记的史料价值;三、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四、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五、谈小说的史料价值;以及两篇附录。

第一篇中关于私家记载的论述已经初步包含了后面的一些内容,如讲到了小说等的史料价值,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比较。当然,我们也可以把

这部分看作是这本书的总论部分,或者是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由于各篇是相继完成而出现的结果。但从后者的角度而言,也可以说是人们历史认知的转变与重视发生变化,使得后面的史料价值份量增大从而产生了专门论述的必要,因而我们会发现《史料五讲》论述的重点是私家记载。

所以,《史料五讲》的目录顺序,可以说在性质上是从愈坚实的材料到愈“浮夸”、“虚假”的内容,如从第一篇的官府文书到最后一篇的小说,但就历史的认知方式以及史学的发展而言,却体现了人们对于历史的洞见越来越复杂、深化的历程。从时间的顺序来看,自探讨从古代延续下来官府文书,到论及多涉及近现代内容的日记、信函、回忆录、小说等材料,则史料越到现今而辨析越加细化,历史认知的深化在其中参与的过程则越加显著。齐世荣先生的《史料五讲》把私家记载作为全书的主要部分展开论述,体现了史料的扩展和

收稿日期:2014-10-19

作者简介:李凯,男,山东潍坊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历史认知的深化。

二、史料的运用与历史认知的深化过程

对于史料的运用与历史认知的深化过程,我初步认为,是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从史料的角度看是对官府文书的重视,以及史料本身考证的重视与运用,这在历史认知的方式上体现为对于历史认知的对象(既包括史书也涉及史事)的重视上。

齐世荣先生在第一篇论文中就讲到了对于官书与私记的三种观点,因为私家记载在后面还会论述,这里集中讲的是齐先生对于官府文书的评价,列举了三种主要的观点。赞扬官府文书的学者认为其由官府支持,具有系统性、连续性的优点,但缺陷在于“时有篡改、伪造和粉饰,出入很大”。^①而贬低官府文书的学者,也是从这些缺陷出发而赞扬私家记载的,但私家记载本身也是有一些的缺点的。齐先生在对比中提出了第三种官书、私记并重的观点并列举了一些人的观点与事例。这些优点与缺点多涉及对于史书、事件的讨论,多论及史料本身真实性的争议,例如列举了明清实录的不断的删改、正史中的回护与曲笔、私家记载的流于诬枉等。在第一篇中,齐先生实际上就提出了对于史料所应采取的态度就是官私并重。但本书的论述重点在于私家记载,同时对于私家记载的选择,日记、信函、回忆录、小说的突出与辨析,也超出了传统史学的分类,如《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史通·杂述》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范围,可见《史料五讲》论述的是史料扩展后的新史料。新的史料的扩展,必然需要新的历史认知的发展,对其加以分析与利用,以促进史学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从一个史学家的责任感出发,齐先生认为有必要从事这项工作,正像本书所论述的“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史料的扩充确实有助于史学的进步。”^②

其次,从史料的角度出发表现为对于新的史料来源的重视,像日记、信函、回忆录等,而这些史料本身往往具有优劣两重的性质,但多成为从当时的时代背景角度来研究社会的心态、风俗以及

经济状况等的重要来源,在历史认知的发展上表现为对历史认知方法与过程的重视,即历史认知对象本身的缺陷不能阻碍对于历史客观性的追寻,新的历史认识方法的产生,对于材料的综合运用超越了历史认知对象本身的缺陷。

齐世荣先生在《史料五讲》中利用日记、信函、回忆录等充分地论证历史。而这些史料也带有很多的缺陷与不足,例如齐先生在谈到回忆录时就系统地列举了五条缺陷与不足,因而在利用的过程中,更加地注重对于历史方法与理论的应用,单纯的史料难以直接解决史学问题,必须结合对于历史的分析与方法的应用。如齐先生在讲到回忆录的时候,谈到了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对于投掷原子弹的一种看法,除去这种观点外,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综合分析,才可以了解美国投掷原子弹的真实目的。又如齐先生在分析书信时,提到曾国藩给曾国荃的书信,劝其注意身体,淮军助战适宜,李鸿章回信说淮军疲惫,无助战之意,必定要结合其他史料综合分析,才能够益见“以上数函透露了湘、淮集团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内情,颇具史料价值”^③,若单纯从书信本身出发则双方一团和气,全无争权夺利之心。因而这里结合时代背景作综合分析的历史认知的过程与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或者说史料本身的简单对错,在脱离了思考者的认知方式后变得苍白无力。再如齐先生在谈及书信的篇章中提到胡适对于傅斯年、冯友兰等人的看法,看似都是针对其人的某一作品,但是综合其他材料,加以心理学的思考方式就会得出其实是源自胡适本人自视甚高,学术故步自封的心态作祟,这里通过对历史材料的综合分析,如结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的编写困境,陈寅恪、傅斯年对冯友兰的评价,杨联陞、陈乐素对傅斯年的评论对比,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大大超出了史料本身所给予的信息。齐先生在对日记的分析中,也大量地运用了综合分析的方法,例如对于威廉的《柏林日记》的分析,涉及的问题不是战争胜负本身,而是法国假战与失败背后的厌战的心态问题。而不列颠之战的问题,涉及的也不是战果,而其统计背

① 齐世荣《史料五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

②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32页。

③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86页。

后的人为夸大的心态问题。而这些结论的发现与得出,抛开综合比较的历史认知方法也是难以得出的,或者说在历史认知的进步关心到这一点之前,这些材料也是易于被忽略的。这里面史料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没有新的研究方法领域的开辟,某些史料的价值也是不能被充分地发掘出来。因而在提到日记时,齐先生就提到“使用日记时,还必须参照、对比其他各种史料,分析综合,方可得出比较正确的认识”^①,即是总结了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再次,从史料的角度看,体现为对于通常不被认为是客观记录的材料利用,例如向来被认为是以虚构为主的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的分析。在历史认知的发展上体现为对于历史认知的主体性的反思与思考,即历史认知的进步发展为对于历史认知的主体相对性的认识,特别重视历史认识主体参与认知历史的过程。这放映在齐世荣先生《史料五讲》中对于后现代主义质疑的回应。

思考人的历史认知的方式,虚假产生的历史,或者说真实是如何被制作成虚假的过程,这样原先不能被利用,不被重视的材料,就有了丰富的可供研究的内容。这就涉及历史认知的问题,亦即最后一部分小说所表达的关于虚假与真实的史料运用的辩证关系。后现代主义有种观点认为历史如同小说,而《史料五讲》中特别有专门的篇幅论证对于小说的史料价值的分析,提出小说有五方面的价值:一、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全貌或一部分(道德标准、风气习惯等);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三、折射出真实的历史事件;四、观人情而征人心;五、提供具体细节。因而齐世荣先生的这本书,虽不奢谈理论,而并非没有针对问题。如后记中所说“后现代主义把一切历史认识的对象归结为‘文本’,说什么‘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德里达语),并认为‘文本’本身并无确定的含义,可以因人而异地做出各种解释,一切解释都是有效的(或无效的)。这种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是根本错误的。”^②当然,齐先生也在注释中提到了辩证地看待“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

识相对性的强调,揭示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对其研究所起的制约作用,都有一定的道理。”^③

其实齐先生的《史料五讲》从史料的角度回应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质疑,同样对于理论问题的一种论述方式,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篇,对于戴震的回应就采用了相同的思路。《朱陆》篇分析了朱子之学与陆王之学的不同研究侧重,然后批评了戴震治学是从考证出发转入义理,实际上是更加接近朱子之学,却因对朱子之学细枝末节的错误而在义理上大加批判,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其中就提到朱子之学侧重道问学,而失之于支离;而陆王之学偏于尊德性,而失之于虚无。从史学的角度来看,一方侧重事实的考证汇总,一方偏重于理论的抽象总结。因而章学诚就提出了针对各自的缺陷的批评,是从理论的角度容易,而从事实的角度困难“则自命陆王以攻朱者固伪陆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陆王者,亦伪陆王,不得号为伪朱也。同一门户,而陆王有伪,朱无伪者,空言易而实学难也。”^④因而从事实的角度上去回应理论问题是能够打下坚实的基础和给予有力的回击的。针对后现代主义质疑,从理论上的回应已经不乏其人,而齐世荣先生无疑选择了一条更加坚实的道路,从史料的角度上,通过分析新史料应用中的真实与虚假的关系,来进行回击,特别肯定小说的史料价值,而其出发点也在于人的主观认知的相对性,无法脱离时代的约束,从而使得虚构的内容而带有真实的历史成分,齐先生先后举了恩格斯、梁启超、杨绛和陈寅恪等人的论述而加以说明。齐先生之所以加重对于私家记载的分析,就在于特别强调在史料的处理过程中,文本的含义,或者说认识的相对主义是历史认知的客观因素,因而处理人的主观因素与历史叙述的关系,同样是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任务之一,而非对于史学客观性根基的动摇。

三、理论、方法和历史认知的发展

史料的扩充与历史认知的深化,是史学发展

①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82页。

②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217页。

③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217页。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朱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9页。

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齐先生也谈到“进入 20 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若干新的学派。新学派为了贯彻它们对于历史的看法,就必须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史料来源”。并举年鉴学派、经济社会史和人口史的例子加以说明,因而得出结论“现代史学扩充史料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①。同时史料的日益丰富又需要理论指导来加以利用分析“搜集史料……做到全面又谈何容易。史家为免于灭顶之灾的自救之方就有赖于理论的提高和方法的改进。”^②无论是包含了历史认知的史学理论的发展,还是从史料本身出发,都能够推导出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理论的出现,能够指导新的研究领域。而要对新的史料进行利用,也需要在历史认知上有新的创新,这反过来也促进了理论的创新。例如齐世荣先生在谈到史料优劣的一些分析,就已经具有了拓展一些新的问题与领域的雏形。例如谈到回忆录中钱基博的例子,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过往多强调政府对于知识分子的从

上而下的作用,知识分子本身处于一种逆来顺受的位置。但是从钱基博的视野而言,齐先生利用回忆录论及他在这场运动中的特殊性,我看杨绛的一些文章就提到了钱基博在运动中的积极性,而钱钟书则采取了另外的态度,联系到钱基博的家学渊源以及钱钟书的留学经历,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多角度具有延续性的观察标本,为史料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各种立场与态度的切入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齐世荣先生的这本书一方面本意是希望通过对新史料的分析与辨析,能规范和提高史学工作者在处理史料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在对于史料的探讨中,特别是对于新的史料的分析中引领或导出新的研究问题与领域,培养创新的历史认知意识,促进史学的发展,从中我们也可想见老先生的学术深蕴以及苦心孤诣。

(责任编辑:仲平)

①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 34 页。

②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 35 页。

博览善择 举重明轻

——读齐世荣先生著《史料五讲》的几点启示

朱露川

“史料”问题是中国史学家长期关注的问题,学界已出版一些专著讨论史料的整理和运用。2014 年 6 月,齐世荣先生新著《史料五讲》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专

讲史料问题的五篇论文,另附两篇涉及史料问题的专论,反映了作者在史料学领域研究的心得和创获。研读此书,深感它对于我们后学拓展史料学视野,进一步掌握运用史料的方法和分寸,进而

收稿日期:2014-10-19

作者简介:朱露川,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